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一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512

23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一册

(1608—1683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
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二册

(1608—1683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
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第一卷 第三册

(1608—1683年)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
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ТОМ 1 1608 • 1683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Главное архи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72

内部发行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1608—1683年)

第一卷

(全三册)

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编
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
中关系》第一卷翻译小组译
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31³/₄印张 733千字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统一书号：11017·427 定价：3.50元

欲盖弥彰

——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前言》

1969年苏联出版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资料集第一卷，收罗了1608至1683年有关中俄关系的国书、诏书、训令、出使报告、函件等二百一十四件。该书编者写了一篇题为《俄中关系形成的过程》的《前言》，对早期中俄关系的历史大肆进行歪曲，竭力为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罪行辩护。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爱尔兰史的片断》）这本资料集就是苏修伪造历史的一个见证。

本书编者吹嘘说，过去发表的有关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史料是“零散的、不系统的”，“在选择发表文件时，常常表现出阶级的局限性和某些研究者的一定政治倾向”，而他们编的这本资料集则“广泛采用早先已发表的文件”，是一个“保存下来的、尽可能完整的材料集子”。它既是客观的、没有什么“局限性”和“政治倾向”的，又是“完整的”，因而不容人们怀疑它的可靠性，只能把它“作为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史料根据”。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本书编者出于卑鄙的政治目的，任意删节、篡改和伪造重要史料，极力掩盖老沙皇扩张主义的侵略罪行，从而“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

在这本资料集里，苏修御用文人歪曲、篡改、伪造历史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我们不妨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

第一，有关臭名昭著的、最早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波雅尔科

夫的文件，本书一个也没有采用。是因为这些文件没有保存下来吗？不是。本书编者在《前言》中还从《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补编》中引用了波雅尔科夫《远征报告》中的一些材料。是因为这些文件不重要吗？也不是。波雅尔科夫既然被捧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最早的“新土地发现者”，那么对苏修来说，有关他的活动的资料当然是很重要的。编者为什么不敢把这些文件收入本书呢？因为这些文件记载了这样的历史事实：黑龙江流域的居民曾经告诉波雅尔科夫，这个地区属于中国，中国皇帝经常派人到这里来征收贡物，从事贸易；以波雅尔科夫为头子的沙俄侵略分子曾经在这个地区敲诈勒索，绑架中国官民作为人质，甚至灭绝人性地吃达斡尔人的肉，被当地居民称为“可恶的吃人恶魔”；当地中国居民曾经英勇地抗击了这伙沙俄侵略分子。苏修要为老沙皇的侵略行径开脱罪责，当然不敢采用这样的文件了。

第二，记载沙俄侵略者哈巴罗夫罪恶活动的重要材料，有许多关键的、要害的地方被删掉了。把本书第 61 号文件同 1949 年苏联教育部国家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加以对照，我们发现，本书编者在把上述材料收为第 61 号文件时删掉了下列几段重要记述：

哈巴罗夫供认，1651 年当他们侵入达斡尔地区时，“所有的人都逃避我们”，“我们从平底木船上向他们开枪，杀死了二十个达斡尔人”，“我们很快包围了这个城寨，达斡尔人从城墙里用火枪向我们射击”。

哈巴罗夫向达斡尔人进行威逼利诱，叫嚷什么沙俄是伟大的国家，沙皇威震四方，任何国家都不敢反抗沙皇，达斡尔人应当缴械投降，向沙皇纳贡，求得沙皇的保护。可是达斡尔酋长断然回答说：“我们是向博格德皇帝沙姆沙康（指清朝皇帝顺治）交纳贡赋的，至于我们如何向你们交纳贡赋，那要等我们断绝子孙的时候

再说。”

在威逼利诱不能得逞时，这个沙俄侵略分子便使用暴力，进行血腥屠杀，“不断用大小枪炮向他们射击”，“把俘虏来的达斡尔人全部砍下头来”，“所有在场的达斡尔人，所有参加猛攻和激战的达斡尔人全被杀死”，一共杀死六百六十一人，抓去妇女二百四十三人，小孩一百一十八人，抢去马匹、牛羊几百只。

苏修御用文人害怕这些资料，他们不敢采用而偷偷地把它们删掉。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险恶用心：他们删掉了有关达斡尔人向清朝皇帝纳贡的史料，妄图篡改历史，来证明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事实上跟满洲的清国既没有政治上的联系，也没有经济上的联系”，从而否定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个铁的历史事实；他们删掉老沙皇的侵略罪行和当地中国居民反抗沙俄侵略者的斗争史料，以便于他们捏造黑龙江地区“于1649至1652年最后并入俄国领地”的，掩盖老沙皇的对外扩张。他们还反咬一口，把“侵略”和“大举进攻”的罪名强加在保卫自己领土的中国人民头上。

但是，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出版的许多科学著作已经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加以有力的论证，这是任何人都无法辩驳的。本资料集的编者尽管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许多篡改，但毕竟还留下了一部分可以反映历史真实情况的资料。例如，第62文件号的卡尔梅克使臣的谈话，提到“达斡尔地区有很多城市，住的全是中国人，统辖他们的是中国皇帝”；第74号文件（沙皇使臣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的第二种文本写道，清朝当局把他们阻挡在宾馆里，不准外出，原因之一就是沙皇的一批军队“正在攻打中国的领土达斡尔”；第93号文件是沙皇致清朝皇帝的国书，在这份国书中，沙皇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军队攻打了达斡尔地区。尽管他狡

辩说，“不知道这个达斡尔地区已归属于您（博格德汗）”，“不知道被打的是中国皇帝的臣民”，但是老沙皇毕竟向清朝皇帝作出了保证：“今后不再派自己的军队到达斡尔地区去”。

在档案中留下的上述记载，反映了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和祖国——中国的关系，证明了黑龙江流域在沙俄入侵以前就是中国的领土，说明了老沙皇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达斡尔地区是中国的领土。这些资料给了苏修这个历史伪造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既然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那么谁侵略谁的问题便十分清楚了。1858年，马克思在批判沙俄侵占我国黑龙江流域和滨海等地领土时指出：“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中国和英国的条约》）。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可是本书编者在《前言》中却竭力歪曲历史，他们硬把黑龙江流域说成是“归并”到俄国的“新领地”，进而污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入侵俄国边境”，把沙俄侵略者打扮成无辜的受害者。

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从1643年沙俄侵略者波雅尔科夫侵入黑龙江地区以来，哈巴罗夫、斯捷帕诺夫、帕什科夫、切尔尼戈夫斯基等臭名昭著的侵略分子多次侵犯中国领土，大肆抢劫和屠杀中国人民，受到中国军民的有力反击，这在中国和外国（包括俄国）史籍中都有记载。1935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也斥责哈巴罗夫是“十七世纪俄国的侵略者”，是“沙俄远东殖民政策侵略计划的传播者”，说他“侵入和平的达斡尔地区”，“残酷枪杀居民，掠夺该地区。城市成废墟，耕地荒芜，居民惊慌不安，背井离乡”。即使在本资料集里，也还留下不少足以证明沙俄侵略我国的证据。例如，早在1650年，雅库次克的军政头目便遵照沙皇谕旨，训令哈巴罗夫，要使博格德王公及其臣民“归附于君主”，“永为

奴仆”，要博格德王公向沙皇“缴纳自己的和自己臣民的贡赋，如金、银、宝石和贵重饰物等”，否则哈巴罗夫就必须“用不宣而战的突袭手段制服他们”（见第 56 号文件）。后来，这个雅库次克军政头目竟然狂妄地写信给“博格德王公”，要他“率领你的全体氏族、你博格德公国属下的达斡尔酋长和全体乌卢斯牧民”归顺于沙皇，并且威胁说，如不归顺，沙皇将“下令消灭你博格德王公，占领你的城市，把你博格德王公及其他王公、你们全体人员连同你们的妻子儿女统统杀光”，好让其他酋长“不战而驯服，不战而听命”（见第 57 号文件）。哈巴罗夫根据沙皇的上述旨意，大肆进行野蛮的侵略活动，他在报告中供认：“我们沿阿穆尔河前进，劝导这些外国人臣服于君主陛下，凡是不肯听从、不愿驯服的，就加以歼灭”（见第 61 号文件）。此后，沙俄哥萨克还不断侵犯我国领土，这方面的记载也屡见不鲜。1676 年，俄国斯帕法里使团前来中国时，一个在中国居住的俄国人向他们提供情报并出谋献策说，由于中国正在进行内战，帝国十分虚弱，“如果现在大君主（指沙皇）在达斡尔地区的军队有二千人，那就不仅可以把整个达斡尔地区，而且可以把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的全部地方都置于大君主的统治之下”（见第 197 号文件）。这番狂言虽然出自一个小人物之口，却反映了老沙皇的侵略野心。直到二百多年以后，最后一个老沙皇尼古拉二世还妄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大片中国领土。

既要“纳贡”，又要“归顺”，否则就要把人家“统统灭绝”，还要一直侵占到长城脚下——这就是沙皇的“睦邻政策”，在这里，老沙皇的扩张主义嘴脸已经暴露无遗。

本书编者千方百计地篡改、伪造历史资料，歪曲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的历史真相，为老沙皇的侵略罪行进行辩护，其目的是为新沙皇的侵略扩张和反华制造舆论，为苏修的霸权主义政策效劳。但是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尽管苏修御用文人挖空心思地为老沙

皇遮羞,结果还是露出了马脚。本书所收集的某些资料,正好给人们提供了老沙皇侵略中国的铁证。苏修玩弄歪曲、篡改、伪造历史的卑劣手法,完全是枉费心机,其结果只能是弄巧成拙,欲盖弥彰。

夏思 1977 年 11 月

目 录

俄中关系的形成	1
古文献导引	36
第 1 号文件	47
1609 年, 不早于 3 月 18 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瓦·瓦·沃伦斯基为托木斯克哥萨克骑兵伊·别洛戈洛夫及其同伴奉派出访蒙古阿勒坛汗和中国没有成功事呈喀山宫廷衙门的报告	
第 2 号文件	49
1615 年 1 月。——外务衙门所编 1604—1605 年与英国使臣托·史密斯关于是否让英国商人过境至印度和中国的谈判记要摘录	
第 3 号文件	52
1616 年 5 月 1 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向外务衙门所提请求的要点	
第 4 号文件	53
1616 年 5 月 2 日。——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谕旨的笔录摘要: 把就英国使臣约·麦里克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决定(即关于探寻前往中国的通路的谈判暂时延期至约·麦里克由瑞典归来后举行)通知该使臣	
第 5 号文件	54
1616 年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29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就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来访卡尔梅克人及遇见中国使臣的情况呈外务衙门的报告摘要	

第 6 号文件	56
不早于 1616 年 11 月 22 日。——托木斯克哥萨克瓦西利·阿南宁为在库兹涅茨克和吉尔吉斯等地效劳及到蒙古阿勒坛汗处出使请求赏赐事呈托木斯克官署的申请书	
第 7 号文件	58
1616 年 12 月 15 日。——军役人员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关于到阿勒坛汗那里出使的情况在托木斯克官署的答问词	
第 8 号文件	63
1616 年 12 月 29 日至 31 日之间。——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就其卡尔梅克地区之行以及在彼处会晤中国使者等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摘要	
第 9 号文件	67
1616 年，不早于 12 月 29 日。——军役人员托米拉·彼得罗夫和伊·库尼津为其蒙古国之行请求赏赐事呈外务衙门的申请书	
第 10 号文件	69
1616 年 12 月 31 日。——贵族杜马关于同中国、蒙古和布哈拉汗国交往问题的决议	
第 11 号文件	70
1617 年，不早于 2 月 2 日。——军役人员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就前往阿勒坛汗处一事在托博尔斯克官署的答问词摘要	
第 12 号文件	72
1617 年 2 月 2 日至 3 月 19 日之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为瓦·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归来事致外务衙门的报告	
第 13 号文件	73
1617 年 2 月 3 日。——托博尔斯克官署接待蒙古阿勒坛	

	汗的使臣斯卡扬·麦尔根及其同僚的记录摘要——使臣们提供的关于邻国的情况	
第 14 号文件	1617 年,不早于 3 月 19 日。——军役人员伊·丘缅涅茨和伊·彼·捷库季耶夫就 1616 年夏前往阿勒坛汗处一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摘要	75
第 15 号文件	1617 年,不早于 4 月 6 日。——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费·瓦·鲍鲍雷金为派遣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马·特鲁勃恰尼诺夫前往中国事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的报告	78
第 16 号文件	1617 年 6 月 20 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与大贵族费·伊·舍列麦捷夫及其僚属就是否让英国商人前往印度和中国一事的会谈记录摘要	79
第 17 号文件	1617 年 6 月 27 日。——贵族杜马就英国使臣约·麦里克所提问题作出的决定的笔录摘要	83
第 18 号文件	1617 年 6 月 28 日。——商人伊·阿·尤金等人就是否让英国商人寻找前往印度和中国的道路一事在贵族杜马的答问词摘要	85
第 19 号文件	1617 年 7 月 1 日以前。——外务衙门为告知俄国与中国交往的情况,给赴瑞典的使臣费·彼·巴里亚京斯基及其僚属的训令摘要	86
第 20 号文件	1617 年 7 月 1 日。——外务衙门在斯·伊·沃伦斯基和秘书官马·波兹杰耶夫奉派出使英国时给这两位使臣的训	88

	令摘要——关于英国商人经过西伯利亚前往中国事	
第 21 号文件	1617 年 7 月 9 日。——英国使臣约·麦里克和大贵族费·伊·舍列麦捷夫及其僚属关于探寻前往中国的道路的会谈记录摘要	92
第 22 号文件	1617 年 7 月 9 日。——费·伊·舍列麦捷夫和德·米·波扎尔斯基转交给使臣约·麦里克的信件摘要,此信附有答复他关于寻找前往中国道路的来信的笔录	93
第 23 号文件	1618 年 4 月 26 日。——俄国使臣与瑞典大臣约·史密特的会谈记录摘要——告知俄中交往的情况	95
第 24 号文件	1618 年 9 月 1 日和 4 日之间。——中国神宗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	96
第 25 号文件	1619 年 5 月 16 日以前。——蒙古阿勒坛皇帝就派遣使者以及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伊·彼特林及其同伴从中国归来等事致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皇帝的国书	98
第 26 号文件	1619 年,迟于 5 月 16 日。——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撰写的中国和蒙古见闻记	100
第 27 号文件	1619 年 7 月 6 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为托木斯克军役人员伊·彼特林及安·马多夫从中国返回事致喀山宫廷衙门的报告	120
第 28 号文件	1619 年 9 月 23 日。——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在索尔多格镇关于他的中国之行情况的说明	121

第 29 号文件	123
1619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10 日之间。——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等人就他们旅行中国的情况在喀山宫廷衙门的问答词	
第 30 号文件	127
1619 年。——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伊·谢·库拉金为装备军役人员瓦·丘缅涅茨及安·沙雷金以便前往中国事致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费·瓦·鲍鲍雷金的公文	
第 31 号文件	129
1620 年 1 月。——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和安·马多夫为中国之行请求奖赏呈外务衙门的申请书	
第 32 号文件	131
1620 年 1 月。——外务衙门为托木斯克哥萨克伊·彼特林和安·马多夫陪送阿勒坛汗的使臣回国及完成中国之行请求奖赏的报告提要	
第 33 号文件	133
1620 年 5 月。——外务衙门就不宜与蒙古和中国发生关系并且就探听这些国家的消息等事转发给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马·米·戈东诺夫的诏书	
第 34 号文件	136
1629 年, 迟于 3 月 1 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哥萨克尼·霍赫里亚科夫和阿尼卡·安德列耶夫前往吉尔吉斯王公伊舍伊处的旅差报告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	
第 35 号文件	137
1629 年, 早于 7 月 2 日。——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军政长官安·杜宾斯基就察哈尔汗占领中国的传闻呈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阿·尼·特鲁别茨科伊的报告	
第 36 号文件	138
1631 年 3 月。——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卡兹·卡里亚金使	

	困到阿勒坛汗处的出使报告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	
第 37 号文件	1631 年 11 月 2 日。——在托木斯克接见蒙古阿勒坛汗使臣巴克士巴伊加尔·巴伊萨耶夫的记录摘要——关于中国事件的消息	140
第 38 号文件	1635 年 1 月 4 日。——亚·叶·图哈切夫斯基使团到阿勒坛汗处的出使报告摘要——关于中国的消息	141
第 39 号文件	1635 年，不早于 10 月 8 日。——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和哥萨克谢·谢皮奥特金为请求派赴中国事致外务衙门的呈文	142
第 40 号文件	1635 年，不早于 10 月 8 日。——托木斯克军役贵族卢卡·瓦西利耶夫和哥萨克谢·谢皮奥特金就他们打算去中国一事在外务衙门的答问词	143
第 41 号文件	1635 年 11 月 29 日。——在外务衙门接见蒙古使臣达尔罕康津一行的谈话记录摘要——使臣关于蒙古与中国边界情况的报道	145
第 42 号文件	1636 年 1 月 28 日。——外务衙门通译普·弗拉斯科伊与阿勒坛汗和喇嘛达因·麦尔根-兰珠的使臣等关于中国情况的谈话记录	146
第 43 号文件	1637 年，不迟于 2 月 4 日。——蒙古阿勒坛汗就同意让俄国使臣过境前往中国事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信件	148
第 44 号文件		150